

# 1956年中共對資本主義 民主態度的兩次轉變

• 段 煉

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後，蘇聯個人獨裁的沉重教訓逐漸公之於眾，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因此轉變了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態度，提出要借鑒其合理部分，來充實和豐富社會主義民主。但匈牙利事件爆發後，中共領導人的態度再次轉變，終止了借鑒活動。目前學術界對這一轉變的相關研究還比較薄弱，本文依據史事，詳盡勾勒其中來龍去脈，並解讀其歷史意義。

## 一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蘇共二十大後，面對蘇聯民主建設出現的嚴重弊端，毛澤東想到資本主義民主運轉了幾百年，卻極少發生類似悲劇，說明它還有部分歷史進步性，其表現形式可以借鑒，以充實和豐富社會主義民主。

1956年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舉行。大會最具有震撼力的文件，是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批評斯大林進行個人崇拜，在1930年代大清洗、衛國戰爭期間和戰後黨內政治生活中犯有種種錯誤<sup>①</sup>。蘇共二十大強烈衝擊了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引發廣泛爭論。當時中國即將完成三大改造，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如何結合蘇聯經驗教訓，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模式，這是毛澤東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使毛澤東敏銳發現，應利用這個歷史機遇，「以蘇為鑒」，從而防止破壞社會主義民主的行為再次出現。鄧小平回憶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sup>②</sup>李慎之也回憶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出不久，就聽到胡喬木講述毛主席的心情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好的路子來。』」<sup>③</sup>面對蘇聯民主建設出現的嚴重弊端，毛澤東想到資本主義民主運轉了幾百年，卻極少發生類似悲劇，說明它還有部分歷史進步性，其表現形式可以借鑒，以充實和豐富社會主義民主。

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主要來自蘇聯。蘇聯偏重於從資產階級專政的角度解釋西方民主，偏重於指出它的表現形式與本質密不可分，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共領導人對資本主義民主的理解。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獨裁制度和極權主義，蔣介石反革命獨裁就是跟它們學的，新中國只能實行人民民主專政<sup>④</sup>。現在毛澤東的態度出現轉變，將資本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和本質分開看，甚至提出借鑒前者，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作報告〈論十大關係〉，提出對蘇聯的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少走一些彎路。報告第十部分是「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毛澤東在此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毛澤東進一步闡述說：「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甚麼能存在？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他明確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毛澤東說此番話明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學習一切國家的一切有益成果，也包括資本主義民主<sup>⑤</sup>。

隨後，毛澤東又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類似思想。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表示，為了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成先進的工業國，「要善於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於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sup>⑥</sup>。9月24日，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到蘇共過去干涉別國共產黨事務時說，「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治」，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可以罵架」。他甚至說，要用西方民主原則來反對大黨、大國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我們反而現在為它鬥爭了」<sup>⑦</sup>。毛澤東還告訴劉少奇，資產階級民主特別在初期有一些很好的辦法，比現在社會主義採用的更進步<sup>⑧</sup>。

在毛澤東大力倡導下，其他領導人也表示了一致態度。5月3日，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論十大關係〉時，周恩來表示說：「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在全世界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世界的前途。……但這並不是說，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國家就沒有可學的地方」，「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sup>⑨</sup>。5月26日，中宣部長陸定一作報告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能夠生存和發展，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凡是他們的長處，不論屬於文藝科學的，……或者屬於其他種類的，我們都應該批判地加以學習」<sup>⑩</sup>。6月17日，劉少奇接見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團時說，社會主義也有它的缺點，必須不斷改善，使它更完善，把任何一個制度絕對化是不妥當的，「外國經驗只能參考，但必須參考，所以我們也參考南斯拉夫及其他國家的經驗，甚至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sup>⑪</sup>。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劉少

毛澤東作報告〈論十大關係〉，提出對蘇聯的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又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明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學習一切國家的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資本主義民主。

奇特意指出：願同各國開展各種交流，鐵幕不在中共一邊，中共的大門對一切人敞開<sup>⑫</sup>。

## 二 尋找政治監督力量

如何借鑒資本主義民主，這在馬列經典著作中沒有明確指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先從政治監督、新聞宣傳、學術研究等領域作初步探索，然後在實踐基礎上慢慢形成理論認識。他們鑒於蘇共長期一黨執政，缺乏來自外部的政治監督，而資本主義民主提倡政治制衡，重視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於是設立對立面「唱對台戲」。

毛澤東非常看重民主黨派的政治監督，他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及中國政黨制度不同於蘇聯，「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他指出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雖然表示接受中共領導，但是他們中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問題上，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sup>⑬</sup>。陳雲對此解釋說：「主席、中央說，今後每項工作中都要有一批人唱對台戲……蘇聯沒有反對派，甚麼事共產黨說了算，結果吃了虧。哪個地方、部門有爭論，哪裏就出真理；反之，沒有爭論，大致要出毛病。」<sup>⑭</sup>本來隨着三大改造的進行，黨內外許多人都認為，民主黨派已基本完成歷史任務，可以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但自從毛澤東等人表態後，這些看法便不再盛行。6月25日，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作報告，提出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將是中共一條「固定不移」的原則<sup>⑮</sup>。

同時，中共領導人嘗試着將「唱對台戲」的主體擴大。6月15至30日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期間，所有與會代表的發言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大多數是黨外代表的批評或建議。如此公開、全面反映人大代表發言，這在以前是沒有的<sup>⑯</sup>。周恩來明確表示，此舉是學習西方議會政治，「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我們不能學……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允許唱『對台戲』，當然這是社會主義的『戲』」。周恩來認為，政府應該讓人民代表批評自己的錯誤，承認應該承認的錯誤，到1957年人大會議上不僅要有小組辯論，更要有大會辯論<sup>⑰</sup>。

毛澤東甚至想仿照西方兩黨制，成立兩個共產黨組織。他的秘書林克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毛主席談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對人民專政，只是對反革命專政，隨着反革命被消滅，專政的武器也要逐漸縮小三千萬，縮小十分之九，則專政機關也縮小十分之九。但是這種機關還要存在……如何保證無產階級民主，是否可以搞兩個黨（共產黨）呢？這還很難設想。」<sup>⑱</sup>

除此之外，中共領導人設想參照美國聯邦制的特點，改革中央與地方政治關係。毛澤東作〈論十大關係〉報告時說，中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但美國似乎不是這樣。美國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聯邦憲法打架……似乎財政和稅收方面，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鑒於蘇共長期一黨執政，缺乏來自外部的政治監督，而資本主義民主提倡政治制衡，重視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於是設立對立面「唱對台戲」。

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統一」。毛澤東還提出「美國這個國家很發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sup>⑩</sup>。6月2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體制會議上講話，也說蘇聯集權過多是一個教訓，也是一面鏡子，「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權，有權才能動員」，「適當分權給地方是為了更好地集權於中央」<sup>⑪</sup>。這些設想直接促成了1958年中央大量向地方下放權力。

### 三 改革新聞宣傳、推動「雙百」方針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於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sup>⑫</sup>。到了1956年，中共領導人認為新聞宣傳的批評性和客觀性還不夠，需要大力改革。3月27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人民日報》錯了要進行自我批評，過去學《真理報》，錯了不能更正，黨報只能登結論，不能發表不同意見，不能爭論，這樣做不對，報紙可以活潑一點<sup>⑬</sup>。劉少奇的態度更為明顯，5月28日，他在聽取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等人匯報工作時說：新華社要學習塔斯社，同時也要學習資產階級通訊社，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的工廠要接受下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驗也要接受下來。劉少奇認為如果這樣做，新華社「和其他通訊社相比儘管觀點不一樣，但是新聞報導是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全面的，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sup>⑭</sup>。

在中共領導人多次指示下，7月1日《人民日報》宣布改版，由原先四版擴展到八版，新增的主要是國際動態和學術文化方面的內容。當天的社論提出改版後，報紙將擴大報導範圍，不論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資本主義陣營的新聞，只要人民希望多看到一些，報紙就多採集、多刊登一些，要開展編讀之間自由討論<sup>⑮</sup>。在《人民日報》改版的同時，毛澤東決定把《光明日報》、《文匯報》交還給民主黨派<sup>⑯</sup>，以推進新聞宣傳改革。幾經努力後，《文匯報》於10月1日在上海復刊，羅隆基任社長，徐鑄成任總編輯；1957年4月1日，《光明日報》中共黨組被撤銷，章伯鈞繼續兼任社長，儲安平接替胡愈之任總編輯。

中共領導人早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就醞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借鑒西方民主的探索為推動「雙百」方針創造了良好氛圍。1956年3月5日，劉少奇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期間同周揚、劉白羽談話，表示黨和政府對作家的政治干涉，必須有正式文件授權，作家不同意可以向中央反映，「對於這種干涉，不論他們是文化局長或是黨委書記，都要他們來一個正式決議，不要口頭講，口頭上發表議論不能算數。」他還表示要讓作家提意見，自由論爭就是要讓大家說話<sup>⑰</sup>。

10月20日，中宣部邀請黨內外專家六十多人舉行座談會，陸定一在會上提出貫徹「雙百」方針的幾點措施：高等學校除繼續開展馬克思主義課程外，有準備有步驟地開設資產階級學說課程，目前康德、黑格爾、羅素哲學課程已在北京大學開設，凱恩斯經濟學課程也將開設；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流學者來講學，唯心主義的或是反動的也可以請；盡可能出席各種國際學

1956年，中共領導人認為新聞宣傳的批評性和客觀性還不夠，需要大力改革。7月1日《人民日報》宣布改版，報紙將擴大報導範圍，不論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資本主義陣營的新聞，只要人民希望多看到一些，報紙就多採集、多刊登一些，要開展編讀之間自由討論。

術會議；講授馬列主義課程時介紹反面路線情況；要出版反動人物的文章全集和選集<sup>27</sup>。

#### 四 毛澤東態度再次轉變

1956年在借鑒資本主義民主的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態度高度一致<sup>28</sup>，但他們始終沒有公開正式倡導，沒有形成明確、系統的主張，原因主要是理論儲備中的基本判斷和國內外的複雜反應。

中共領導人堅信，資本主義民主實質上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與社會主義民主存在根本差別。所以1956年中共領導人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態度有明確底線，他們承認它的表現形式是有益的，可以拿來借鑒，但其基本原則是反動的，不能用來動搖、改變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然而，資本主義民主中哪些是本質，哪些是表現形式，其間的聯繫與區別怎麼體現，革命導師和經典著作都沒有明確答案，中共領導人只能在實踐中謹慎摸索、細心判斷。

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毛澤東的態度陡然轉變，重新認定資本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只服務本質，體現本質，借鑒形式最終也會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權。既然借鑒資本主義民主已經在匈牙利造成消極後果，那麼中國的類似政策必須緊急剎車。

儘管中共領導人舉動很有分寸，卻依然引發不僅強烈而且複雜的反應。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敏銳地察覺到變化，興奮之餘積極發表意見和建議，有些主張明顯偏離了社會主義軌道。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東歐國家改革派領導人非常歡迎中共的舉動，「保加利亞文藝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感興趣」；波蘭各界也「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但蘇聯的態度剛好相反，中央書記蘇斯洛夫(Mikhail A. Suslov)回憶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同志們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引起了我們深刻的懷疑」，這「意味着放棄黨領導文學、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原則」<sup>29</sup>。陸定一曾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 F. Iudin)通報「雙百」方針，尤金拿出列寧的一篇文章讓陸定一看，實際上是反對這個方針，事後陸定一感慨地說：「蘇聯的教條主義真是厲害」<sup>30</sup>。

在主客觀因素影響下，中共領導人的處境非常矛盾，而匈牙利事件激化了這種矛盾。匈牙利事件公開爆發始於1956年10月16日學生遊行，要求按照民主原則改革政治體制，從23日起布達佩斯秩序失控，新領導人納吉(Nagy Imre)宣布結束一黨政治，實行多黨制，要求蘇軍撤出匈牙利。事件中許多匈牙利人把中共領導人視為同志，認為「中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納吉甚至來到中國大使館，希望毛澤東和周恩來幫助匈牙利<sup>31</sup>。

蘇共二十大後，匈牙利和中國幾乎同步開始改革，現在前者發生了政治動亂，於是毛澤東認為匈牙利一些人(包括黨政幹部和知識份子)打着民主、人權、自由旗幟，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另一方面他也必須和匈牙利劃清界限，打消蘇聯疑慮。在毛澤東的力主下，中共中央要求蘇聯出動軍隊平息事件。此後，毛澤東的態度陡然轉變，重新認定資本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只服務本質，體現本質，借鑒形式最終也會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權。毛澤東決定，既然借鑒資本主義民主已經在匈牙利造成消極後果，那麼中國的類似政策必須緊急剎車，否則就會重演匈牙利事件。

其他領導人還不很清楚毛澤東的迅速轉變。11月10至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認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叛亂，根本教訓在於領導幹部脫離群

眾，應該借鑒西方領導人任期制，「華盛頓在革命之後，作了八年總統，又退為平民。這件事對我們很有影響，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當然我們不一定完全照那樣辦，但恐怕有些東西，資產階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sup>②</sup>。毛澤東的考慮則明顯不同，他提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結果自食其果。毛澤東以王飛和李慎之提出實行「大民主」為題<sup>③</sup>，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sup>④</sup>。

## 五 領導人的共識：由部分肯定到全面否定

受匈牙利事件影響，中國政治形勢也出現一些動蕩。從1956年下半年起，全國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各地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

面對如此形勢，許多領導人開始認定，毛澤東關於重演匈牙利事件的預見快要得到印證了。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楊尚昆記錄了與會人員的擔憂之情。李井泉說「黨內外均有些風波，反映在各級黨大會上，都強調民主、反對集中，只批評、不自我批評，不說成績、只說缺點，個人、集體，強調個人利益」，「學生中是兩個問題：物質利益；思想意識（地、資出身份子），要自由，海德公園、俱樂部，懷疑合作社的優越性，責難多的是對技術措施」。劉仁說各大學教授的思想動態是，「凱因斯學說是對的；社會主義無優越性；蘇聯是經濟民主、美國是政治民主，南（斯拉夫）則二者兼有之；領袖經常換，以免個人崇拜；周、劉應有各自的政綱，以備人民選擇」。張德生說「工人中發生的問題是極端民主化。發生事件17起，參加的有幾千人。學校中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sup>⑤</sup>。

當1956年12月底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澤東再一次明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不等於允許修正主義泛濫，修正主義思潮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的觀點得到其他領導人支持，經由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通過，〈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公開發表。文章指出，如果有一種民主可以被利用來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活動，被利用來削弱社會主義事業，那麼，這種所謂「民主」就絕不是甚麼社會主義民主。文章還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容許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都不允許同資產階級民主混淆起來<sup>⑥</sup>。〈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公開標誌中共領導人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態度再次轉變：由肯定表現形式、否定本質，轉向到既否定形式也否定本質。雖然鼓勵民主黨派進行政治監督，改革新聞宣傳，推行「雙百」方針等措施依然存在，但指導方針已發生根本改變，借鑒資本主義民主實際上畫上了句號。

進入1957年，毛澤東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還在繼續，但他對資本主義民主已全面拒絕。2月27日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毛澤東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公開標誌中共領導人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態度：由肯定表現形式、否定本質，轉向到既否定形式也否定本質。雖然鼓勵民主黨派進行政治監督，改革新聞宣傳，推行「雙百」方針等措施依然存在，但借鑒資本主義民主實際上畫上了句號。

中共領導人對西方民主的認識存在教條化傾向，沒有很好地將其表現形式和本質作出科學、合理區分，加上對國內外局勢變動的反應過於敏感，他們的態度在不到一年時間裏兩次轉變，倉促終止了實踐探索，更終止了尚待深化的理論探索。

提出有些人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那麼整一下，學匈牙利那樣，他們以為歐洲的自由民主很好，說人民代表大會跟西方議會民主比要差，主張兩黨制。他在此強調說，其實民主是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sup>①</sup>。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說：百家爭鳴，說一百家，其實只有兩家；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說百家，無非言其多也<sup>②</sup>。毛澤東力圖把即將開展的全黨整風限定在社會主義軌道上，不允許藉資本主義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sup>③</sup>。這為日後整風設下了政治標準，也為反右擴大埋下了伏筆。

如何正確處理資本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和本質，來為社會主義所用，一直是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點，也是難點。最早提出利用資本主義民主表現形式的是恩格斯，他在晚年認為要借助資本主義議會開展工人運動，「它給了我們到人民還疏遠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的獨一無二的手段，並迫使一切政黨在全體人民面前回答我們的抨擊，維護自己的觀點和行動」<sup>④</sup>。列寧也提出利用資產階級民主的各種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後，列寧一度完全否定資本主義民主，但後來他提到需要重視資本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認為「也要向資產階級學習。他們善於保持自己的階級統治，他們有我們不可缺少的經驗；拒絕吸收這種經驗，就是妄自尊大，就會給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sup>⑤</sup>。遺憾的是，列寧逝世後斯大林過早中斷了這一探索，將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完全對立起來。

1956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提出西方民主有肯定的價值，可以有條件地借鑒，這是他們在初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益嘗試，也是為了突破蘇聯既定模式，更好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是，中共領導人對西方民主的認識存在教條化傾向，沒有很好地將其表現形式和本質作出科學、合理區分，加上對國內外局勢變動的反應過於敏感，他們的態度在不到一年時間裏兩次轉變，倉促終止了實踐探索，更終止了尚待深化的理論探索。

### 註釋

①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92。

②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33。

③ 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轉引自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122。

④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8。

⑤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6日。〈論十大關係〉公開發表時，修改了一些語言措辭。而李慎之的現場筆記顯示，毛澤東作報告時對西方民主的借鑒之意非常明顯，比如「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參見李慎之：〈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頁121。

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542。

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27。

- ⑧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35。
- ⑩⑪⑫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72；591；561。
- ⑬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324。
- ⑭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76；367。
- ⑯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63。
- ⑰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6日。
- ⑱ 陳雲還認為，在公私合營企業使用資方人員也是「唱對台戲」，「人家當面提意見，不要紅臉，標準在於講的是不是真理。對於黨員來說，只要對，就應該接受」。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51-52。
- ⑲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18-19。
- ⑳ 以前召開全國人大歷次會議時，《人民日報》只摘要編發代表的發言，且大多為讚揚之話。
- ㉑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07。
- ㉒ 林克：《林克日記（1955-1964）》（手稿），未刊，轉引自沈志華：《思考與選擇》，頁290-91。
- ㉓ 〈論十大關係〉公開發表時，毛澤東這段講話被刪掉，後來薄一波將它公布。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88。
- ㉔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2005.12）》（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頁157-58。
- ㉕ 《人民日報》，1956年7月1日。
- ㉖ 《光明日報》原係由中國民主同盟創辦，1953年變為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合主辦，實際主持為報社中共黨組；《文匯報》1938年創辦於上海租界，解放後上海市委主張該報停辦，1956年4月《文匯報》自動宣布停刊。
- ㉗ 陪同劉少奇的陳毅也說：「作家應該有獨立的見解，獨立的風格」。參見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186-88。
- ㉘⑳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433-34；430。
- ㉙ 沈志華對此情況就指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似乎都考慮過這個問題」。參見沈志華：《思考與選擇》，頁289。
- ㉚ 轉引自沈志華：《思考與選擇》，頁298-99。
- ㉛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頁298-99、417-18。
- ㉜ 1956年11月初，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副主任李慎之向毛澤東秘書林克建議，現在的民主是小民主，要實行大民主，開放新聞自由，建立憲法法院。「大民主」和「小民主」概念由此產生。參見李慎之：〈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頁46-49。
- ㉝⑹⑺⑻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23；367-68；409；430。
- ㉞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47、259。
- ㉟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頁583-84。
- ㊱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516。
- ㊲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41。